

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项目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体育改革 (中国体育改革三十年)

刘德佩 白君玲 等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德佩, 1947年10月生, 博士, 教授, 解放军体育学院社科研究中心主任, 大校军衔。1979年开始从事体育社科研究至今, 著有《体育社会学》专著,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5年当选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扩大执委和《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SSR)》编委。1997年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规划与评审组副组长。



白君玲, 1950年12月生, 满族, 副教授, 大校军衔, 广东省政协委员。1985年开始从事体育管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体育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论文多次入选亚运会科学大会和奥运会科学大会。现服役于解放军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邓小平同志阅读《体育报》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23届奥运会入场式上

前 言

1978年以来，中国古老而广袤的大地上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引起和推动这巨大变化的思想基础，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十年动乱，使国家安定团结、民主协商的政治气氛荡然无存，将国民经济拖入濒临崩溃的边缘，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无不遭到严重的破坏，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原已缩小的距离又被急剧拉大。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成为每个中国人，甚至每个关心中国或敌视中国的外国人都极为关注的问题。

在十年动乱中饱尝精神和肉体痛苦，两次遭到政治迫害和打击的邓小平同志，怀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一颗赤子之心，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以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政治勇气，创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率领全党全国人民突破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我国体育事业和全国各行业一样，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恢复了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在奥运会上实现了“零”的突破，继而跻身世界竞技体育的强国之列；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北京亚运会，国际社会对中国组织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能力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公布实施，囊括各色人群的大众体育深入人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体育法》颁布，体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法制的

轨道；体育科技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校体育进步明显，我国第一次系统掌握了青少年体质状况；体育产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第三产业的新生力量；中国军人加入国际军体理事会，在捍卫军旗荣誉的赛场上屡屡夺魁……

回首沉思，中国体育事业在这 20 年间之所以能如此辉煌，无不得益于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无不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

小平同志关心体育、热爱体育，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积攒 5 个法郎去看一场国际足球赛，被后人传为美谈。以致日本友人访华时专门选择金色的足球短裤作为送给小平同志的礼品。小平同志善打桥牌，并将其视为最好的休息；他喜爱游泳，而且尤其喜欢在大江大海中游泳，他说：“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他有自己总结出的一套健身方法，而且坚持不懈，即使在被迫害的逆境中也不中断。由于小平同志自身对体育有实践、有体会，所以对体育的理解也更深刻。他指出：“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

小平同志 50 年代和 70 年代在中央分管过体育工作。无论对中央政府中体育管理机构的设置还是运动训练体制的构建，甚至运动队作风的养成，都有过明确的指示。改革开放后，作为国家和民族前进的领路人和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仍亲笔为第五届全运会和《中国体育报》题词，亲自过问筹备亚运、争办奥运的事情。

亲历改革开放 20 年，在体育战线工作的同志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这 20 年祖国体育事业的进步实在是太大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没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取得这些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

要结合体育改革的实践，深入学习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会其精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以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

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但是，从1978到1998这20年，对中国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其间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改变中国命运的变化。就体育领域来说，将这20年跨度的历程记录下来，供亲历者回顾品味，供未来者了解学习，供专家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探讨，求索规律，无疑是意义非凡的一件大事。尤其对在全国近百所体育院系就读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更盼望能有一部这样的研究成果，作为他们结合专业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教材。

本课题组的同志中有资深的体育理论工作者，他们在自己教学训练和科研的岗位上亲历了这改革开放的20年；也有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不同阶段成长起来的新生一代。不同的两代人之间存有“代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在对这一研究意义的认识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大家都以深入探索中国这20年的体育实践为己任，早在1995年就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文献，收集资料，进行长期的研究准备。1997年体育学被列为国家一级学科，有关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的重点方向，这为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理论与我国体育改革创造了条件。同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体育改革》被立项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规划课题（批准号：97BTY009）。本书即是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

本书共分10章，其中白君玲撰写第一章、第七章；李国与刘德佩撰写第九章；潘海峰与刘德佩撰写第十章；其余各章由刘德佩撰写。黄文仁、刘颖收集了大量资料并参与了有关章节的讨论和修改。课题组组长白君玲完成了附录——《体育改革大事记略》的全部选取编录工作，并负责对全部书稿的修改和编纂。

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原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以及其他各司、体育科研所、体育信息所、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和各项目管理中心等有关部门提供了许多文献资料，在此，真诚地感谢这些文献的提供者和作者们，没有他们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课题研究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许多领导和同行的支持，有幸亲聆了我国体育改革不同阶段决策参与者们的真知灼见，是他们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帮助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减少了谬误，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文章千古事，作者的责任自不待言。然而，二十年的巨变，事件起伏交替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恳请读者们从为中国体育改革二十年的历史负责的高度，不吝赐教指正，以便再版修正，在此先致谢忱。

著者谨识

2001年5月30日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奥运模式”的形成 (1)

 第一节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
 创造和发展 (1)

 第二节 “奥运模式”打破了历时 21 年的僵局 (3)

 第三节 我国首次全面登上国际体坛 (6)

 第四节 实现两岸体育交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8)

第二章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体育法》的诞生 (12)

 第一节 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保障 (12)

 第二节 有法可依,中国第一部体育法的诞生 (14)

 第三节 以法治体,开创体育新局面 (18)

第三章 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体育社会化之路 (23)

 第一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23)

 第二节 社会化——中国体育腾飞的一翼 (25)

第四章 科教兴国,科教兴体 (31)

 第一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31)

 第二节 体育战线的科教事业 (34)

第五章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42)
第一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2)
第二节	走向世界,为国争光	(45)
	亚运会上成绩显赫	(46)
	奥运会不辍进步	(51)
	中华武术走向五大洲	(52)
第六章	从娃娃抓起,学校体育改革成果丰硕	(55)
第一节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要从娃娃抓起	(55)
第二节	学校体育改革成果丰硕	(58)
第七章	发展群众体育,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	(66)
第一节	体育是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66)
第二节	全民健身步入制度化科学化轨道	(69)
	群众体育有了法律保障	(70)
	实施新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71)
	跨世纪的宏伟计划《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73)
	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为全民健身提供了技术指导	(77)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体质测试标准	(78)
第三节	改革使群众体育呈现出勃勃生机	(80)
	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80)
	群众体育的硬件建设发展迅速	(81)
	全新的群众体育组织形式——全民健身服务网络	(83)

生机盎然的社区体育.....	(84)
农村体育的发展.....	(86)
弘扬民族文化的民族体育.....	(89)
残疾人体育得到重视和发展.....	(92)
第八章 “小政府、大社会”， 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94)
第一节 改革是为了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94)
第二节 “小政府、大社会”， 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成绩斐然.....	(97)
第九章 体育产业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	(105)
第一节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05)
第二节 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产业	(109)
体育无形资产得到重视和开发	(109)
走上法制轨道的中国体育彩票	(109)
“中体产业”上市成功营运	(111)
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用品博览会	(112)
初具规模的体育竞赛市场	(114)
有偿训练,体育俱乐部的兴起	(116)
第十章 军队体育的改革与发展	(118)
第一节 军队就是要提高战斗力	(118)
第二节 改革开放促进了军队体育的发展	(121)
与世界接轨,加入国际军体理事会	(123)
突出军队特点,推行《军人体育锻炼标准》...	(125)

解放思想,军队体育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深化改革(127)
主要参考文献(129)
附录 中国体育改革	
二十年大事记略(1978~1998)(133)

第一章 “一国两制”的构想 与“奥运模式”的形成

第一节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马克思主义 国家学说的创造和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许，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拥有4亿5千万人口的新中国从此诞生在世界的东方。然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新中国的疆土还没有得到统一，即香港、澳门和台湾还分别处于英国、葡萄牙和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之下。香港和澳门问题是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问题，它们的回归与祖国的统一是属于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中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之间的带有国际性质的问题；而台湾问题是我国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属于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不容许别国插手干涉的。如何在纷纭复杂的背景下实现祖国领土的统一，不仅关系到祖国的发展及民族的昌盛，而且是关系到亚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亘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始终视祖国的统一为己任，将祖国统一作为自己奋斗的重要目标。

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变幻莫测，国内发展日新月异、今非昔比。如何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一直是令人时时思索的一件大事。时至 70 年代末，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思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治构想。1978 年 11 月 5~14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前往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4 日，在小平同志离开新加坡回国途中路经仰光机场停留时，与缅甸总统吴奈温举行了会谈，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亚洲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小平同志讲：在解放台湾问题上，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要统一。这是“一国两制”构想最早对外界的流露。1979 年 1 月 30 日，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在华盛顿由 6 个美国团体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状和现行的制度。

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文章和讲话中又多次深入地阐述了这一政治构想的精髓，使“一国两制”的思想逐渐成熟，成为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4 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却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1984 年 10 月 31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吴山友时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

“一国两制”构想是针对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后来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时首先被付诸实践。然而，最早体现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践，却是在体育领域内，即促使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使我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战略部署——“奥运模式”。

第二节 “奥运模式”打破了历时 21 年的僵局

自 1894 年 6 月 23 日国际奥委会成立，1896 年 4 月 6~15 日在雅典成功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世界上深深地扎下了根，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到世界每个角落的宏大社会现象。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核心——国际奥委会，虽然是一个封建贵族式的组织，但是其领导之下的奥林匹克运动对世界和平、各国人民的友谊及合作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我国早在 1922 年便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派运动员参加了第 10、第 11 和第 14 届奥运会的比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仍与国际奥委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52 年 2 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宣布：中国将派出运动员前往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 15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然而，当时国际奥委会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却置《奥林匹克宪章》的原则于不顾，拒不邀请我国参加。为此，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主席埃德斯特隆，申明我严正立场和正义要求。中国奥委会的立场和态度，赢得了世界舆论和国际奥委会中正义之士及芬兰朋友们的广泛支持，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际奥委会不得不纠正错误，终于在开幕式前两天，作出了邀请我国运动员参赛的决议。但是，它同时也邀请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单独参加，并申明尽管邀请台湾参加，并不影响中国在奥运会中的席位问题，这是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政治阴谋。

此后，国际奥委会在几次会议上，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次会议上终于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仍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在其后国际奥委会一系列的有关会议上，董守义、荣高棠等人一再提出抗议，指出台湾的体育组织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体育组织，无权代表中国，希望国际奥委会不要制造“两个中国”。但布伦戴奇却坚持错误立场，反诬中国在“搞政治”，甚至称台湾过去“不是属于中国的”。1956年以后，陆续有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并允许他们占据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有关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不得不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和有关9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联系，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也声明拒绝与布伦戴奇合作。从此，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被迫中断长达20年之久。

当代体育已发展成为覆盖全球，虽不是政治，却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政治作用的一种力量。而国际奥委会正是领导世界体育的最大组织，我国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游离于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之外，是为了不给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留下口实，实属不得已之举。同样，中国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且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也是不完整的。为了寻求解决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问题，国际体育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但始终没能得到解决。

1979年，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终于到来了。那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当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明确阐述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略方针，呼吁海峡两岸尽早实现“三通”（通邮、通商、通航），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来结束两岸长期以来的军事对峙状态。1979年1月30日，小平同志在访美期间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状和现行的制度。”

据此，党中央批准了在国际组织中针对台湾问题的新方针，将以前关于“蒋帮”的提法改称为台湾当局，把驱蒋改为撤消台湾当局的会籍或撤消其会员资格。

在一些非政府性国际组织内，除了全国性席位由我国有关部门占有外，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章程的不同规定，可以允许台湾非政府机构作为我有关组织机构的分支参加，或允许其作为非全国性机构参加，名称可以是“中国×机构台湾分会”或“中国台湾×机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或单独以“台湾”的名义在国际组织中出现。中央新的对台方针，为在国际奥委会中长期未能解决的我国合法席位和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如何争取在国际奥委会中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当时在国家体委、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同志中间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决策的最后关头，是小平同志亲自拍板，力排众议，才一锤定音。

在1979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明确表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只应该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考虑到让在台湾的运动员亦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可允许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留在奥林匹克运动内，但它的旗、歌和章程等均应作相应的变动。

基于我国对外工作多年的良好基础，在国际友人的充分理解